

基于元问题的人类学张力结构

□ 王宇丰

内容提要 人类学是一门极富张力的学问。在若干张力分类体系中,划分元问题和本问题的张力结构更符合人类学本身的学科结构。围绕着实证主义——人文主义、宏观——微观、静态——动态、主位——客位、“他者”——“我”等几大元问题来梳理繁杂的学科张力,可以建立一个清晰有序的张力层次系统。由一对对辩证关系织成的该张力网中,蕴含着包括人类学独特性及发展史在内的丰富学科信息。

关键词 人类学 张力结构 元问题 本问题

作者王宇丰,华南农业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讲师。(广州 510642)

哲学意义上的“张力”指矛盾或对立,还可进一步引申为在对立两极之间保持平衡的能力。社会文化人类学(以下简称“人类学”)就是一门内部饱含张力的学科。人类学的张力拉锯贯穿了整个学科发展史,也充斥于各个流派或分支之间。在表现多样的学科张力之中发现其层次结构并进行系统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掌握该学科的发展动力及脉络,同时更深入地理解该学科的诸多特性。

一、学科张力的类型结构

很少有一门学科像人类学那样容纳了如此多元且相互竞争的观点或做法。在学科内部纷繁的对立、争议、论辩之中,可以同时采用多个标准来进行类型或层次划分,均能使之有序化,并最终建立起一个个清晰的张力结构。若以冲突人物及情节为线索,则张力系统是由米德(M. Mead)和弗里曼(D. Freeman)、斯托尔(D. Stoll)和孟珠(R. Menchu)等学者之间一个个生动故事组成的;若从时间序列看,我们可以发现从古典人类学到现代人类学,再到后现代人类学的不断反思、嬗变又再生的纵向演化结构;若从空间序列看,我们又可

以发现北方人类学与南方人类学、英法社会人类学与美国文化人类学之间的横向竞争格局;若从张力自身的作用性质来看,则能见到两类不同的张力:互不相容型和相互制约型;当然,更常见的分类坐标还属学术流派的分野。如:历史特殊论、反进化论、新进化论批判历史特殊论、新进化论又受到文化唯物论的修正和补充。

能否找到层次感更强、更接近学科本身结构的类型系统?借助学科的三层次结构来进行分析就是这样一种尝试,即首先把学科研究分为“元问题”和“本问题”两大层次,本问题内部又进一步细分为总问题和分问题两个子层。其中,元问题属于学科的基本问题,涉及该门学科的哲学基础和理论前提;本问题属于学科的对象问题,是对元问题的具体化。^①一门学科的元问题常由为数不多的几条前提假设所组成,这些假设事关如何看待学科研究对象的基本性质。针锋相对的元问题立场,换言之,截然相反的理论预设,总是成对出现,从而产生学科的基本理论视角之争。人类学的元问题就围绕着若干学科主题,表现为几对宏观的辩证关系及其张力,下文将逐个地展开叙述。

二、是社会科学还是人文学科?

人类学的学科属性问题是该学科的元问题,其本质是方法论问题。从方法论到研究方式再到具体技术,学科方法体系的这三个层次^②严密地分别对应于上述的元问题、总问题和分问题。

(一) 方法论层次

方法论作为社会文化研究的逻辑和哲学基础,居于人类学学科属性问题的核心位置。方法论倾向上的实证主义(实践理性)与人文主义(意义理性)的截然对立,是导致学科归属上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之分的根本原因,也被称为是“现代社会思想的关键问题”。^③

实证主义坚守客观主义立场,视社会文化现象为客观事实,因而主张运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人类及其文化,坚持通过经验分析进行因果解释,否则就斥为不符合科学的基本要求。而人文主义秉持主观主义立场,强调社会文化现象具有不同于自然现象的特殊性,反对照搬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提倡通过历史综合、批判、投入理解和借助内省,充分利用研究者与被研究者同样是人的优势,去阐释现象背后的动机、价值和意义。在逻辑论证路线上,前者采取了演绎式的理论检验,后者选择了归纳式的理论建构。基于不同哲学传统和理论预设的两种方法论带来了各异的研究指导范式,产生出两种完全不同的研究过程。认同实证主义的人类学家努力将人类学建设成一门社会科学,探求人类文化的通则;同时人文主义者视其为人文学科,积累多样性的文化知识。

人类学在不同的时代盛行着不同的方法论,早期的进化论、传播论、结构功能论、文化唯物论等均具有实证主义的渊源;自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70年代趋烈,随着哲学认识论的转向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泛起,新兴的象征人类学、解释人类学、民族方法论、反思式民族志等则与人文主义存在密切联系;随后的后结构主义又否认主观与客观的区别。有关“科学”和“非科学”的矛盾是如此尖锐,以至于斯坦福大学人类学系在1998学年被迫分成两个科系“人类学”(实证)和“文化与社会人类学”(人文)。^④不过,更多的人类学家采取了更为开放包容的态度,认为人类学兼具这两个门类的特征和优势。沃尔夫(Eric Wolf)就说

“人类学是所有科学学科中最富人文特征的学科,也是所有人文科学中最富科学特征的学科。”^⑤热菲尔德(Robert Redfield)比喻人类学在方法上“扑向”自然科学,同时却又被其与人文学科共享的主题——文化“拉了回来”,并称人类学家“有自由确定自己是人文主义者还是实证主义者,但同时做到两者无疑会有趣得多。”^⑥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确认了人类学在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两栖性。^⑦王铭铭也声称自己既是一个文化价值观的相对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社会认识论的普遍主义者。^⑧

(二) 研究方式层次

研究方式是研究的具体方式,选取何种研究方式直接受到上层方法论类型的影响。反过来说,作为元问题的方法论可以派生出一系列研究方式层次的对立关系,如:定性与定量,结构式与无结构式,等等。

定性研究从属于人文主义,定量研究从属于实证主义。人类学研究具有浓厚的定性色彩,因该方式特别擅长于微观的个案调查和深入的意义解析,最富学科特色的田野工作就是定性的。墨菲(R.F.Murphy)等人认为人类学并非一门精确的科学,^⑨但并非说人类学家就不做定量研究。跨文化比较是与田野工作方法齐名的另一人类学利器,它就依靠定量方法,擅长于宏观数据统计和因果关系分析。到上世纪后半叶,有部分“科学”的人类学家向社会学家靠拢,在研究中采用了较多的定量技术。

不同的方法论倾向也造成了结构式调查与无结构式调查的分野,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需事先详细计划并进行标准化提问,其程序、方法和所提问题本身均是固定不变的;而后者无需计划且不带具体设问进入调查现场,待到观察过程中再临时安排研究方案。人类学重视开放灵活的无结构式调查,而少用封闭的结构式。该争议的一个具体表现在于人类学家进入田野前是否需要研究假设,主张悬置任何假设的属于人文论指导下的无结构式调查,以研究对象为中心,事后再进行理论概括;主张预先带着假设问题进入的属于实证论指导下的结构式调查,以研究者为中心,在假设引领下有目的地进行观察检验。

(三) 具体技术层次

处于方法体系中层的研究方式又进一步决定了底层具体技术的选用。定性研究要求人类学家依靠参与观察、深入访谈、语义分析等具体技术,有时辅以 Ethnograph、Nvivo 等质性分析软件,这些都是田野调查中常用的技术;而定量研究则制约着人类学家必须运用概率抽样、标准问卷、统计分析等技术,高度依赖 SPSS、Stata 等数据统计软件。由于定性方式占据着人类学研究的主流,因而定性技术为多数人类学家所推崇,借用美国人类学家克虏伯(A. Kroeber)的话来说“我们特别坚持田野工作,且将它视为一项机会、一项特权和专业上的特征。因为我们希望能和我们的研究主体面对面地接触。社会学的匿名式问卷对我们而言是冷漠隔阂的,即使问卷的专业化和量化是我们人类学的方法所不易获得的一种资产。”^⑩ 该态度带来的是与其他学科迥异的调查行为,不管是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在卓布里恩德岛长达14个月的经典田野调查,还是亚利桑那大学人类学系的著名垃圾研究计划,都令人印象深刻。

研究方式上结构式与非结构式之别,在具体技术层面则相应地体现为正式提问与非正式提问的差别。正式提问借助事前设计好的标准化问卷、量表、访谈提纲或观察项目清单(观察卡),可以获得预期的调查结果。它适用于系统化的课题研究,例如:土地占有模式、财产分配制度等;^⑪ 非正式提问常见于人类学家在陌生的田野实地有偶然发现时,意外而重要的收获亦随之产生。该法突破了调查者自身认知的局限,也避免了僵化问卷的束缚,更适合于自然地收集丰富多样的文化信息。

三、知微能否见著?

微观与宏观之间是否具有联系?又是何种联系?这是人类学另一大主题。该元问题范畴内的争议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本问题维度:

(一) 个体——整体

“人类学提出的都是大问题,同时却从一些小空间的研究中提取其最重要的洞见。”^⑫ 探讨人类学有关个体与整体的关系,就绕不开费孝通与利奇(Edmund Leach)的论争。个体的调查成果是否对整体具有代表性?或者说人类学家所投身的小社会可否视作大社会的缩影?利奇在评述《江村经

济》时指出费孝通借助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并不能概括整个中国的国情,“这种研究并不或不当自称是任何个别事物的典型。这样做的旨趣是在它的本身。”费孝通则认为,江村不能代表中国所有的农村,但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一种中国农村的类型,“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步接近整体的。”^⑬ 人类学重视个体及其琐事,但更强调在整体观指引下拼合出文化全貌。格尔茨的提醒是“我们在村庄中研究,但不研究村庄。”

(二) 事实——理论

论及微观事实与宏观理论的关系,可以提一提哈里斯(Marvin Harris)对博厄斯(Franz Boas)的批评。博厄斯后期致力于微观事实资料的积累与修订,忽视了宏观理论的概括,以致在拥有大量精确的文化资料基础上却不能总结出研究对象文化的全貌及性质。^⑭ 哈里斯认为不能抛开理论,因为“事实为自己讲话的情况非常之少。”^⑮ 但总的说来,博氏还是认为调查局部的目的是为了了解整个文化;另一方面,他又说只有了解整体才能正确地了解局部。^⑯ 伊根(F. Eggan)说道“人类学百年史的主要变化是资料与理论的关系”,今天的“人类学依然既是概括性的学科又是历史性的学科。”^⑰

(三) 田野——书斋

塞利格曼(Charles Seligman)、马林诺夫斯基、博厄斯等人在上世纪初创立并践行了田野工作方法,该法是对古典人类学者躺在摇椅里做研究的革命。现代人类学非常重视第一手实地资料,把从事田野工作视作人类学家必经的成年礼。有意思的是,当众多人类学家走向各处田野去考察一个个具体文化,带来的是巨量民族志成果对人类文化知识宝库的充实,这又为跨文化研究和理论提炼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结果“回归书斋”的呼声重又抬头。尤其是默多克(G. P. Murdock)建立起世界范围的“人类关系区域档案”,使得宏观的跨文化比较方法逐步走向科学规范,并于二战后复兴。现今,要成为一名专业的人类学者,就要经过从学院(书斋)到田野、再从田野回到学院的三段式历练,以实现经验观察与理论思辨之间的长期互动和紧密结合。张光直特别欣赏这种结合,他说人类学的特点是“把个别文化放在从时间上空间上所见的各种文化形态当中来研究,同时这种研究是要基于在个别文化中长期深入的田野调

查来进行的。用这种做法所获得的有关人文社会的新知识,一方面能够深入个性,一方面又照顾了世界性;一方面尊重文化的相对性,一方面确认文化的一般性。这种做法,这样的知识,是别的学科所不及的,因而造成人类学在若干社会科学领域内的优越性。”¹⁸

四、静态整合还是动态变迁?

关于社会文化如何构成和运行,人类学在认识上存在着两大相互对立的传统。均衡观将文化结构比作有机整体,强调均衡稳定是结构的常态和本质特征;另一极端的冲突观则认为均衡是暂时的和脆弱的,强调在结构内部张力作用下文化将不断变迁。这个元问题层次上的根本分歧导致了理论流派等多个方面的差异。

(一) 结构——过程

在人类学诸个学术流派当中,涂尔干(Emile Durkheim)和莫斯(Marcel Mauss)的社会学年鉴学派、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主义学派、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的结构功能主义、格鲁克曼(Max Gluckman)的新功能主义、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结构主义人类学等都服从于均衡观的指导,其理论观点建基于静态的文化结构;对应地,泰勒(E. B. Tylor)和摩尔根(L. H. Morgan)的进化论、怀特(L. A. White)的新进化论、斯图尔德(Julian Steward)的文化生态学、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等又均受到了冲突论的影响,理论观点聚焦于动态的变迁过程。在学科发展史上,两大阵营此消彼长,各有盛衰。人类学诞生之际是进化论盛行的时代,而涂尔干以降结构功能学说一度成为学科的理论基石,再后的后现代主义甚至质疑“文化”结构是否真的存在过。

(二) 共时性——历时性

研究方法在时间维度上分为共时性研究和历时性研究。均衡视角看到的社会文化是个趋稳的结构,少有纵向的变化,因而往往忽视历时性研究。此外,早期在殖民地上的田野经历令西方人类学家普遍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惯式,即那些无文字民族也是“无历史”的,故此只需做共时的横剖面调查。但也有一些人类学家进行过全面的反思,弗思(R. Firth)就指出马林诺夫斯基仅作静态分析是不够的,因为“仅分析结构是不能解释

社会变迁的”;¹⁹伊万-普理查德(E. Evans-Pritchard)也认为了解社会的过去要比不了解更全面,“人类学离不开历史研究”。²⁰另一方面,进化视角看到的社会文化处于不断变迁之中,这就要求人类学家在时间跨度上划分发展阶段并作对比分析,即历时性研究。

(三) 认识——改造

持均衡观者既然认为社会文化是个具有整合趋向的稳定结构,那么就几乎没有人干预加以改造的空间,他们认为人类学的任务只需对文化结构做出满意的描述和解释;而持进化观者是向前看的,他们不会停留在非介入式的研究,而是将人类学研究更进一步推向人类文化的计划变迁。这类学者会较为现实地接纳各民族的现代化转型,并在其中扮演某种中介角色。在人类学家群体中,注重知识反思的“反思派”接近于前者,注重社会重建的“重建派”类似于后者。不过,赞同改造文化的人类学家并不会站在纯粹局外人的立场去代对象做决定,遇到不可避免的改造时,他们主张应该从主位的角度代对象发出声音。

五、主位还是客位?

人类学家总有一大困惑始终挥之不去,即表述和解释一个文化的权利应该归谁,是归该文化的局内人(主位)还是局外人(客位)?又是谁的研究效果更佳?

早期的人类学曾争议过是否应该研究包括西方自身在内的所谓文明社会,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就因首次将田野工作对象转向文明社会而获得了里程碑式的学术地位。但这也引发了利奇在研究者角色上的质疑,因为“社会人类学家研究自身社会的某一方面时,他们的视野似乎会被私人偏见,而不是公共的经验所歪曲”故而“对没有经验者我是不会推荐的。”他认为研究熟悉的本文化比研究陌生的“他者”(异文化)困难得多。²¹到底是面向本文化的主位研究还是面向异文化的客位研究更可靠?费孝通的回应是:人类学家研究本文化的确会面临很难“出得来”(超脱理解)的问题,但若研究异文化也会遭遇很难“进得去”(移情理解)的困境,“双方各有长短”。况且,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经验,将已有经验作参考体系来进行反省,则社会人类学田野作业的对象“实质上并没有所谓

‘本文化’和‘异文化’的区别。”^②外部视角与内部视角界限的模糊甚至消失的确意味着人类学家已迈入了一个新境界。至于如何协调主位与客位,周大鸣主张“人类学的研究应该从主位的角度去观察,客位的角度和全球的视角去研究。”从而将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

六.“他者”还是“我”?

除了学科自身的理论预设,外在于学科的某些重要主题也能成为学科的元问题。人类学家的特殊价值观背景就是这样一个元问题,它在几个向度上衍生出不同的张力。

(一) 西方——非西方(南方)

人类学诞生于19世纪的西方,它伴随着欧美列强的殖民扩张而成长,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影响。在早期的人类学家看来,“我”仅指西方,“他者”指广大的“非西方”世界。后殖民时代迫使人类学重新定义“我”与“他者”,非西方学者的视角开始获得学科的关注和重视。巴勒斯坦裔理论家萨义德(E.W.Said)就指出人类学属于殖民主义的“东方学”之一部,是西方想象建构和知识权力运作的结果。美国人类学家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和斯里兰卡裔人类学家奥贝塞克拉(G.Obeyesekere)的之间的论争也是东西方矛盾的一个著名案例,后者认为前者以西方帝国主义代理人自居,神化了登上夏威夷的库克船长,结果编造了一个欧洲式的神话;^③前者也质疑后者是否享有洞察夏威夷土著如何思考的特权。^④除了“东方”之外,“西方”因多处北半球而拥有了另一个对应概念“南方”。非洲和拉美位居欧洲和北美的南面,当地人类学家故而提出“南方人类学”,以区别于欧美人类学。^⑤其实,人类学的一大优势就是能够敏锐地发现并果敢地抛弃文化偏见。许多西方人类学家都能清醒地意识到自身的文化局限,他们站在文化相对观的立场上,使非西方的异文化成为一面反观并拷问本文化的镜子。正如弗思所言,他注重非西方人民的风俗习惯是“因为对他们的生活方式进行研究能帮助我们明白自己的习惯和风俗。”^⑥或如费孝通所言:为了“我看人看我”。

(二) 原始——现代

在横向上,人类学令西方和非西方互为明镜;

在纵向上,人类学家则以原始的“他者”为镜来观照和审视现代的“我”。从一定意义上讲,人类学是一门好古的学问,它本属现代智慧的一种,同时又是对现代精神的某种叛逆。当其他社会科学家都聚焦于现代社会研究之时,人类学家却投身于无文字社会、无国家社会、初民社会、原始社会、“野蛮”社会、“落后”社会、简单社会、小规模社会、前工业社会等各种形态的传统社会。人类学立足于这些传统社会的丰富材料,获得了批判“现代性”的独特而可贵的视角。由探究“人类从哪来”到思考“人类将往哪去”,可见该学科的终极关怀和哲学高度。引用王铭铭的话来概括:“人类学这门学科追求一种反思,它企求获得一种特别的历史深度和一种相对的文化立场,来理解人类生活的不同可能性,企求在这种理解当中揭示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⑦

(三) 学术——应用

人类学到底应该做纯学术研究,还是要经世致用?不同的人类学家会有不同的答案,因为各自文化背景和时代处境的差异造就了他们在价值观和择业动机上的差异。费孝通提及利奇时说道“我们的分歧归根到底是出于我们并不都是英国人,包括Ma-linowski在内。”“入学的动机可能是我们两人同在一个学术领域分道扬镳的根源。”与将人类学看作“一种罗曼蒂克式的逃避”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同,也与将之看作“艺术的一种形式”的利奇不同,费孝通学习人类学是为了“想学习到一些认识中国社会的观点和方法,用我所得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⑧持出世态度的人类学家只管生产知识,而不理会知识将会被如何运用;持入世态度的人类学家没有止步于仅仅认识文化,而是要进一步参与有计划的文化变迁。不过,与其他力主改造社会的社会科学家的区别在于,他们更富人文关怀,在制订发展计划时充分了解并尊重当地社区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观。

张力源自对立两端之间的拉伸,因而表现为一对对的辩证关系。除了上述各对关系之外,人类学张力结构中还存在社会文化唯实论和唯名论、遗传决定论(先天)和文化决定论(后天)、社会人类学(英法)和文化人类学(美国)、经济人类学领域中实质论和形式论等诸多争论。人类学作为一个充满了各种张力的集合体,虽然给学科带

